

目 录

“七·九”事件史料

- 桂林“七·九”事件简介……………(1)
- “七·九”事件前后……………高天梅口述 陈贞娴记录(4)
- 悲悼和怀念……………侯 甸(17)
- 宁死不屈……………古子坚 苏裕翠 苏德源(21)
- 记苏爨烈士的一生
- 我所知道的桂林逸仙中学“七·九”事件
- 经过……………罗筱坤(27)
- 一九四二年轰动一时的
- 桂林苏、罗、张事件……………侯雅云(31)

桂 林 人 物 志

- 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靳汝端……………靳为藩 靳为霖(38)
- 我的自传……………魏继昌(51)
- 附：魏继昌简历……………(57)
- 回忆我的父亲……………魏保琼(59)

桂 剧 名 伶 志

- 清末以来已故桂剧名伶志……………丘振声(64)

桂林出版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出版的主要刊物……………王文彬 (110)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书店、出版社简介(上)……………魏华龄 (123)

二师史料

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史……………苏蔚三 (145)

桂林“二师”校史鳞爪……………宋厚初 (168)

工商史料

清代桂林巨商罗炤致……………罗启鉴口述 张心微整编 (178)

张永发的发家史……………刘开泰 (188)

传统食品史料

桂林的传统食品概述……………周 邦 侯小兰 (208)

对《抗日时期桂林大火及沦陷经过》

一文的订正……………冯 璞 刘维楷 (233)

勘 误…………… (236)

桂林“七·九”事件简介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国民党中统和桂系当局在桂林市大肆逮捕我地下党员，这一事件称为“七·九”事件。

“七·九”事件是由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引起的。皖南事变后，桂系当局撕掉了假开明的伪装，积极反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被迫撤离。由于我地下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白区工作方针，行动谨慎、机智，敌特一直没能找到线索，无从下手。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郭潜在广东粤北被捕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和南委部分机关，七月初，又带中统特务到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七月八日晚，特务首先逮捕了省工委的梁耀宝，梁立即叛变，供出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南委交通员张海萍等。七月九日上午，敌特逮捕了苏曼、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以后又陆续逮捕了桂林的地下党员二十多人。苏曼、罗文坤、张海萍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拒绝招供。敌特用酷刑得不到任何东西，就设下圈套，故意将他们三人假释，暗中派人监视，以便将我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一网打尽。苏曼等三同志回到逸仙中学后（当时他的公开职业是涉

校教师），在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通知党组织，也无法向不了解情况误来接头的同志告警，遂决定以集体自杀的壮烈行动来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党的组织。七月十二日，苏曼、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在苏曼的寝室内并排自缢牺牲。事后，特务机关向他们的上司报告说：“三人同时自缢身死，事出仓猝，殊为骇异。”国民党的反动喉舌《扫荡报》却胡诌什么这是“桃色案件”，对我英勇不屈的烈士进行污蔑并为反动当局洗刷罪责。

事件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当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立即从桂林撤退，使桂林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党员得以保存下来。随后，钱兴和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冒着生命危险，分赴柳州、玉林、贵县、荔浦等地通知一些党员转移，并对今后的工作任务和活动方法作了具体部署。继任的省工委副书记黄彰转移到桂东南活动。钱兴还设法和被捕入狱的党员取得联系，教育他们保持革命气节，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庄炎林同志还秘密进入香港，变卖了一批家产，为省工委提供活动经费。

“七·九”事件后，广西党组织和南委的联系中断。钱兴同志几经周折，才通过原桂林“八办”留下搞联络工作的张兆汉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间接联系（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钱兴同志到重庆，才和南方局得到直接联系）。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发展。

在十年内乱中，“七·九”事件真相被歪曲，反动派的罪行被颠倒成共产党的“罪行”，许多党员被诬为叛徒，苏曼、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为党献身的英勇行为亦被诬为

“自杀叛党”。一九八二年一月，区党委正式为苏曼、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平反，蒙冤终于得到昭雪。

（原载《广西日报》，一九八三年七月六日）

“七·九”事件前后

高天梅口述 陈贞娴记录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参加南委在广州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上，我认识了黄彰同志，训练班结束后，组织决定调我随黄彰同志到广西工作，到广西不久便同黄彰同志结婚，结婚后经贵县、桂平转到桂林。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我们住在桂林市体育场南面的一条小街，房东姓杨，当时，同我们接触的有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负责同志石磊（曹瑛）和广西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直接联系，指导广西工作。

一九四一年冬天，为了掩护省委领导，党组织在桂林市东郊六合路开了个小牛奶厂，作为省委联络机关，组织就派我在此工作。厂里养有四头水牛，每天可以挤十几磅牛奶，供应着三十多家订户。厂里只有两个伙计，放牛的叫小王，是地下党员；挤奶师傅姓何，是雇来的非党群众。当时经常出入奶厂的有钱兴、黄彰等省工委负责同志。钱兴在桂林市内的公开职业是中学教师，黄彰同志由于经常要到各地布置检查工作，他以“水客”的身份出现，经常走南闯北，干着“大宗交易”，其实什么生意也没有做，连日常生活费用都是从奶厂收入里开支。不过旧社会的“水客”都是买空卖空，手头不存积货物的，所以走南闯北，都是空来空去，别

人也不生疑。

地下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起来抗日救国。同时大力向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投降妥协的卖国政策。为了及时掌握情况，指导斗争，省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经常碰头开会，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地点都在牛奶厂内。

由于斗争尖锐复杂，牛奶厂又是接手搞的。我们对挤奶师傅老何并不很了解，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不多加注意。有一次我检查老何的工作时就发现有贪污行为。他在牛奶里渗上水，多灌了几个奶瓶，但是不入账，由于这个意外的发现，我开始注意他的行动。要查清楚多灌的奶瓶他到底送到哪里去。我暗地跟了他好几天，发觉他每天送奶到《扫荡报》，送奶名单上是根本没有这个订户的。我心想：《扫荡报》是国民党最反动的报纸，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很多是特务分子，老何为什么要送奶到那里去？他有没有问题？他会不会暴露牛奶厂的秘密？我及时将情况向组织反映，几个领导同志非常注意这一严重情况，马上进行分析。钱兴同志首先说：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目前敌人对抗日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正千方百计在它的统治区内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以讨好日寇，我们千万不能有所疏忽。”

黄彰也说，皖南事变后，广西反动当局想在后方掀起一个反共高潮，各种特务四出活动，正在寻找缺口，侦察我们的行踪，应该进一步了解老何的情况。第一，这个人贪污，品德上就不好，品德不好而政治上可靠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他暗中送牛奶为什么偏偏送去特务窝的《扫荡报》？这

里面有没有政治问题，不能不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过了几天，果然出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那是十二月的一天中午，钱兴、黄彰等正在屋里开会，我走出后门草坪上望风，啊，迎面就碰见一个生面人在奶厂周围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这人穿的是中山装，一眼就看得出来不是郊区老百姓，也不象观赏风景的游客。奶厂后门根本没有通路，来往的人都是从前面通过的，这家伙一定不是个好东西。于是我咕咕咕地叫起来——这是给屋里发暗号，叫他们警惕防备，外面有可疑的人。这家伙见我到处找鸡，转了几转，也就悄悄走了。我看见他走远，才跑进屋说明情况。

钱兴同志说这人很可能是敌人的密探，由此又联想到老何，问老何的政治面貌弄清了没有，由于当时环境困难，时间也短促，老何的底细我们一时还没有调查清楚。大家都觉得这对地下工作的安全是个很大的威胁，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我又出后门继续望风，他们再继续研究。

过了一会，钱兴同志出来叫我进去，他说：奶厂可能已经暴露了，组织决定立即撤退，但奶厂要留人坚持下来继续处理业务，应付环境，把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住，使领导同志能够安全转移。接着，他又郑重地说：“四哥（即黄彰同志）下午六点以前就要离开桂林，组织决定留下你守奶厂，掩护大家撤退。这是非常艰巨的重要任务，我们和四哥都考虑过，留下来有很大危险，你经过敌人监狱的严重考验，万一这里发生意外，我们相信你能够经得起任何风险。”

我毫不迟疑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钱兴同志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不管有多大的危险，我也要把这任务担当起来，只要领导同志能安全转移，纵使牺

牲我一个人也是有价值的。我心里想：如果敌人单捉到我，对党的损失不大，反正他们不能从我身上捞到油水。

时候不早了，钱兴等同志马上要走了，他们临走时一再嘱咐我：六点钟以前一定要掩护黄彰同志离开桂林，七点钟以前要赶回奶厂，避免敌人发觉把交通切断。

送走了钱兴他们，已过了五点，我赶紧收拾东西，送黄彰到南门搭车，快到车站的时候，我迅速把藤篾交给他，小声说一句“再见”就回奶厂。我一路跑，一路想：家里不知道怎样了，如果特务已经在家等着，应该怎样对付呢？还有那个姓何的又该怎样对付呢？同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尾巴”钉梢。我回到家里已经七点，老何马上出来问我：“他们今晚都走了吗？”我说：“朋友要黄老板和小王去外地进货。唉，生意难做，牛奶又没多少捞头，我打算把奶牛卖出去转做别的生意，你看哪里有工做，还是挤奶去吧。”所以过了两天老何就走了。老何走后，少了一份内忧。我也曾想过，如果他真是个坏蛋，虽然离开了奶厂，敌人一样可以做出恶毒的勾当来，危险的处境一点也没有减少。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几个领导同志和小王已经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过了将近两个月，没见敌人有什么动静。我想，是不是敌人已经知道地下党领导人已经转移暂且放过我不管了？还是敌人还没有掌握到我们真实情况？我每天都在想着这些问题，同时又考虑到快两个月了，组织上还没有派人来联系，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日夜替他们担心着。直到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黄彰同志来找到我，心里这块大石才算放下。黄彰同志指出，奶厂这个地点不能继续使用，要赶快换个地方。他还说到上次离开这里时的心境，

他首先叹了一口气，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我想起上次我走时，思想上很矛盾，明知留你下来是有危险的，但为了党的工作，虽然危险，也要留你下来。”他又说：“当时在决定生死关头的紧要时刻，你的态度非常勇敢坚定，不受一点私人感情的影响，这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看你当时不象一般女人。当组织决定把你留下来，把掩护我们撤退的重大任务交给你的时候，我估计你可能有害怕或依依不舍的情绪，谁知你完全相反，到车站时把藤筐交给我还说声‘再见’。我当时想：这次也许就是生离死别，永远也见不到你了。确实，阶级斗争越激烈，敌人对我们越残酷，我们就要越坚定。你在紧急关头的表现，给我很大的启发。”

黄彰同志一来就和钱兴同志取得了联系。两天以后，我们搬了家。我们的新居在东江镇江边街，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小伙房。同屋住的还有一个黄三姐。离屋不远的地方就是警察岗。我们考虑有警察站岗的地方，特务们总会“放心”些。我们在江边街把家务安置好，就开始做起“生意”来。这次我们的生意是卖故衣。这时候调来了一个覃八哥（党员），也是做掩护工作的。以后，我每天和八哥挑着故衣到桂林市体育场旁边去摆卖，早上十点左右挑出去，下午四五点钟收摊。大雨天在家盘点。黄彰还是专做走“水客”“老板”。

这时候，在地下党的发动下，坚持抗战民主的宣传运动正在广泛开展起来，反对当亡国奴、反对汉奸卖国贼、反对投降倒退、反对独裁专制的呼声震荡四方。各界人民纷纷向国民党要求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受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阴谋和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的本质，明显地在人民面前露出来。敌人非常害怕和憎恨人民力量的日益强大，便加紧对我地下党进行法西斯镇压，便衣特务象疯狗一样，到处疯狂追捕我地下党人员和进步人士，蓄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地下党的活动从此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

一九四二年初夏，南委派郭潜到广西检查工作，他到我家找黄彰同志了解广西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见我们吃的是糙米饭，就提意见说：“为什么不买点好米？还买这种米来吃！”当时我听了很生气，就批评了他，“难道现在有糙米吃就错了？多少人连饭都吃不上呢！”他说：“现在有条件了嘛！”我说：“有什么条件？我们用一个钱都考虑到是不是应该呢。……”他走了以后，我对黄彰同志议论他，我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对我们说这些话，他对生活上看法不对头。

不久，黄彰到韶关向上级汇报工作。他到韶关的时候，在街上碰见一位姓雷的同志，这位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党训练班学习时认识黄彰的，他知道黄彰是广西党的负责人。本来，平时碰见一向都不打招呼的，所以这回碰见也没有招呼就走过去了。可是走过以后，彼此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因为黄彰想了解一下韶关方面近来的情况怎样，雷也想问问黄彰知不知道韶关的情况。雷首先问：“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黄说：“刚到。”雷问：“你身上有没有钱？”黄说：“有钱。”雷说：“你马上走，广东省委已经被破坏了，负责人被捕，找不到人了。”于是黄彰立即离开韶关回桂。回到桂林后，黄彰和钱兴同志等分析当前政治形势，研

究广东组织被破坏之事会不会波及广西，万一波及广西又如何对付等等。

几天以后，已经是六月中旬，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天热得象火烤一样，我们照例把故衣担子挑到体育场旁边摆卖。我因头痛，摊子摆好后，就到对面小铺子去休息一会。这小铺子的老板是北流县人，姓刘，因同是做生意的，又都讲白话，容易混熟。我到小铺子刚坐下不久，突然来了一个面貌凶恶的家伙，跑到小铺子来凶神恶煞似地问刘老板：“喂！对面故衣摊子是不是你的？”刘老板不懂那家伙的来意，吱吱唔唔的答不上来。我站起来说：“故衣摊是我的，你有什么事？”那家伙不怀好意地朝我打量了一阵，便急急忙忙退出门口看门牌号码，然后又急急忙忙走了。等他走远了，我回到衣摊上问八哥，八哥说那家伙先到故衣摊来看衣服，装模作样挑挑选选，每一件衣服他都翻来翻去，里里外外都看过，看完衣服连个价钱也不问，即“关心”起衣摊的老板来，查问老板到哪里去了。八哥朝对面一指，这家伙就跑到小铺子来了，我们认为这家伙来意不善，说不定是个特务，跟上我们了，怎么办？我想马上收摊回去又不合时间，会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不回去吗，钱兴、黄彰和苏曼等同志正在家里开会，他们会不会被特务发现？我和八哥商量了一会，决定提早收摊，我先走，八哥等一会再收摊。我们都互相嘱咐，走时要提高警惕，发现有尾巴就迅速改变方向，暂时不要回家来。

我回到家里，领导同志还没散会，他们正在继续研究当前政治形势和今后工作方针等重大问题，我把刚才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黄彰同志也说，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有个人从窗

口探头进来，鬼鬼祟祟的，经过分析，一致认为这两件可疑的事同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可能敌人已经跟上了我们的行踪。敌人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疯狂，局势恶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看来敌人是要向我地下党开刀，情况是严重的，最后，决定立即撤退，暂时分散转移。晚上七点钟以前，领导同志先后走了，八哥最后走。我还是和上次一样，在住地坚持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到桥头和一个同志碰头，想不到却在那里碰上了八哥。我小声问他为什么还不离开这里。他说昨天晚上九点钟他被警察局以“小偷”的罪名抓去关了一夜，现在要他找老板来担保。我详细询问了他被抓后敌人审问的情况及敌人要他出来找老板时他如何回答，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等等。他说：“我说老板去进货了，只有老板娘在家。我是和老板娘闹架跑出来的，她能来保我吗？”因为走前我们已经讲好因闹架出走，狗腿们不理，说你找不到老板和老板娘就不放你。出来的时候未发现“尾巴”。

我想，敌人是不是知道八哥的身份，故意放他出来找老板，从而达到破坏地下党的阴险目的呢？要是那样的话，我出面去担保，就是自投罗网了，而且没有得到上级指示，万一出了问题，后果就严重了。但我也考虑到，我们的处境虽然危险，毕竟敌人还抓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八哥是可靠的同志，一向对组织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无论如何应该先担保他出来，不然夜长梦多，说不定敌人还会耍阴谋诡计。于是我回家带了做生意的商号油戳，装得象个老板娘的样子到伪警察局去保八哥。

我一进到伪警察局，一个小头目就恶狠狠地问我：“你

是他什么人？”我答：“是他的老板娘。”又问：“他为什么昨晚深夜出来？”我答：“他是因为跟我闹架才出来的。既然他要走，我就另请伙计嘛。”又问：“他挑的行李是他自己的还是偷别人的？”我答：“是他自己的铺盖，不是偷人家的。”他又问：“那你敢担保他不是偷的吗？”我答：“既然他不是偷的，我当然敢担保他。”伪警察说：“这样你盖章吧。”我盖了章，就把八哥保出来了。

从伪警察局出来走了一段路，我看没人跟踪，才嘱咐八哥马上搭车去贵县，千万不要在桂林停留。

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我再仔细考虑，虽然敌人没有拿到我们的真实凭据，这样跑到伪警察局去担保八哥，确是危险的。我负有掩护秘密机关的重任，怎能这样乱闯呢？我又想到，听到八哥报告情况时，自己既然也曾知道有危险，上级又不知道，为什么又还要去呢？当时让八哥马上离开桂林不就完了吗？本来如果我们有钱，尽可以不要这些行李，可是我们的经济很困难，八哥也很穷，不要那担行李，他怎样过冬呢？！所以只好冒这个险去担保他。过后我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他们说胆大包天。

第三天，有个说广东话的男人突然闯进我的卧房来。那时我刚刚烧完《新华日报》和一些其他文件，地上一堆纸灰，火灰还红。我想，这一关可能过不去了，抓就抓吧，反正可以留给敌人做证的东西都销毁了。可那家伙却装着没发现地上那堆纸灰，找些闲话来和我扯，接着提出要我让出个房间租给他。我说老板和工人出外面进货，回来还要住，不能出租。这家伙马上追问：“老板姓什么？现在去哪里进货？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老板姓王，到衡阳进货，大约十多天

以后就回来。其实“老板”是转移到玉林五属一带活动。这家伙又问我过去在哪里读书。他不相信我没有读过书，我有点生气了。我说：“中国千千万万人都不识字呢，这有什么奇怪？”前房三姐听见我被纠缠不清，就猛催我进去吃东西，我趁机摆脱这魔鬼，最后他还厚颜无耻地说：“明天再来。”

第二天中午，那家伙又来了，仍然纠缠着要租房子。但他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要租多久，愿出多少房金等等，却连一次也没有提起过，这就明显地暴露出了他的马脚来。他不是来租房子，而是企图了解黄彰他们的去向，并监视我这座房子的，我想，倒不如给他个答复，免得他天天来，于是对他说：“好了好了，不要啰嗦了，前房三姐要搬家，到时候，腾出个房间给你，但要等老板回来，十天以后你再来和老板商量。”

因为黄彰他们临行时，钱兴同志曾对我说，过几天安排好了，就来通知我走。我想，现在已经过了几天，最近一两天内组织就会有通知来的，让敌人十天以后来扑空吧。我暗中把行李收拾停当，同时把那一百件故衣寄存在伪高等法院一个朋友家里。只等组织一通知，马上可以离开。谁知又一连等了八天，还不见组织派人来接头，我思想上紧张了，再过两天，坏蛋就会来，而且会赖在这里住下，那就麻烦透了。趁敌人没有来，先撤退吧？但组织没有来命令，共产党员难道可以随便离开组织指定的岗位做可耻的逃兵？不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我想，如果特务真搬到这里来住的话，就设法在前后门做出暗号，以免我们的同志再进这房子来。

到第九天早上七点左右，我走出后门去倒垃圾，猛抬头看见钱兴同志站在斜对面小巷里，他注视着我，向我做了一个手势，就转身走进小巷去了。我看看左右没有人，便向小巷走去，跟在钱兴同志后面。他一直走到月牙山脚比较僻静的地方，才放慢了步子，我加快步子跟上去，钱兴同志才说：

“四嫂，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说：“平静无事”。当时要不是尽力克制，我的泪水就会涌出来了。

钱兴同志高兴得笑起来，说：“谢天谢地！大家都说你已经被捕了。”原来前两天钱兴同志曾派×××来通知我撤退，她走到门口，看见房前坐着个警察（岗警有时也到处乱走的），不敢进去，以为我已经被捕，回去就报告说我已经被捕，警察已经监守了屋子等等。钱兴同志曾经几次想方设法派人寻访我的下落，也得不到结果，心里很不安，决心要把我找到，所以今天早上冒着危险亲自跑到这里来。领导同志这样忘我地关心下级，关心同志的安危，使我大受感动，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钱兴同志接着小声对我说：“现在组织决定你立即撤离桂林，下午两点钟搭民船到梧州转回贵县找黄彰。”

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钱兴同志告别。遵照钱兴同志的指示，我当天按时离开了桂林，辗转回到贵县，在乡下找到了黄彰同志，在患难中重逢，悲喜交集。

那时，已经是六月底了，他正在那里召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会议，传达和贯彻省工委桂林会议的精神。

过了十多天，大约是七月十二或十三日，黄彰同志正在会上布置工作，忽然从桂林来了一位同志叫金石声，他向黄彰同志报告桂林市地下党遭受破坏的消息：七月九日，反动派

下了毒手，在叛徒梁耀宝的引领下，开始对我地下党进行疯狂的破坏，苏曼及一部分党员被逮捕，钱兴同志坚持在桂林市内指挥撤退。大家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无不万分愤慨，同时又为钱兴同志顽强坚毅的精神所感动，大家都表示：顶住风险，更加顽强地战斗，用不屈不挠的斗争，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和迫害。后来据其他同志汇报，钱兴同志撤退到灵川肖雷同志家里，在那里起草并印发《告父老同胞书》和《告全党同志书》。

“七·九”事件以后，黄彰同志敏捷而镇定地布置退却，把已经暴露的党员调离原来的工作地区，把党的组织和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到一九四三年初，由于彭维之叛变，敌人向我地下党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在柳州、南宁、梧州、玉林五属等地，到处逮捕教师和学生，这便是广西的“一月”事件，这一次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由于形势的恶化，必须找个地方重新建立党的联络总站。黄彰同志乃于一九四三年八、九月间转移到来宾县大湾，通过地下党员甘化民同志的关系到柳江县板塘村，在那里以烧瓦窑为掩护，建立交通总站。我是十月去的。我们和几个临时工挖泥、踩浆、打坯、割草准备自己开办瓦厂。为了掩护和方便秘密工作者的活动，就指示甘化民在大湾镇中心又开设一间“天马行”，专做代客转运买卖，从经理到伙计全都是自己人，生意很兴旺，后来又在大湾镇西门外设立一间砖瓦厂，梁山（周汉平）、杨林和陈真（范姑）他们当小学教师，陈雄、刘琼、黄恺、陈达德、郭坚等同志，都在这一带工作。

一九四三年冬，钱兴同志秘密来到板塘村和黄彰同志会见以后，他们就分别深入桂东和桂东南地区，在广大的农村